

第六章 結 論

黑格爾曾強調：「創造性格，就是創造一個獨特、完整的生命世界。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真人，都是完整的活人。每個活生生的人，其本身就是一個『世界』。而性格是生命和靈魂的表現，只有寫出其複雜豐滿的性格，人物才有生命的活力，才能在傳記作品的篇頁上直立起來。」¹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與墓誌銘等傳記文，跳脫了傳統史學書寫的限制，承襲並改善前人書寫的闕漏，著力人物形象的刻畫，呈現活絡而生動的人物形象。同時也將文章的篇章結構、句型、字詞等敘事技巧做適當的安排，提升傳記文藝術性的美感。除此之外，歐陽修秉持傳記文「不朽而存」的意義與價值，對傳記文採取「據實直書」的創作態度，希冀傳記文可流傳久遠的特性，將其所要表達的核心理念，即採《春秋》筆法，「寓褒貶於敘事之中」，向時人與後人揭示正確的「忠孝」標準。

第一節、歐陽修傳記文的寫作意義

本論文著重於突顯傳主們的性格，在內容與結構上歐陽修都必須要在歷史取材的真實性中，強調傳主活動的性格與人生的生動性。法國傳記文學作家莫洛亞提出：「傳記文學是藝術，是『文史』的結合，作為歷史要『求真務實』；作為文學要『力求其美』」²歷史的文本和文學的敘述構成了傳記文的基本要素。傳記文必須兼顧歷史的真和文學的美的和諧統一，求真是求美的基礎，限制了傳記文不能違背歷史事實，而敘述的文學性則通過語言實現歷史敘述的真實，成就了傳記文的特性。以下就史學與文學的角度來探究歐陽修傳記文的寫作意義，讓歐陽修傳記文研究更臻完整。

壹、人物與敘事的史學意義

馬克斯和恩格斯指出：「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³傳記文中的傳主以及與其相關的人物，都在所屬的歷史時代與社會環境中生存與經歷世事。歐陽修寫人物傳記反應出歷史和時代對人物的影響，歷史環境在傳主身上產生各種影響力，使人物具有時代感與歷史感；另外，人物對歷史與時代的進程所表現的反應也會有一定的推動力。這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係，即是傳記文寫作所要表現的歷史性。傳記可以說是歷史的形式之一，所以人不僅是受歷史支配的客體，同時也是創造歷史的主體。⁴

¹ 見黑格爾《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第一卷，頁336。

² 見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75。

³ 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97。

⁴ 見安德烈·莫洛亞著，陳蒼多譯《傳記面面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0。

一、教忠教孝、不朽而存的教化意義

歐陽修無論在撰寫《新五代史》或是碑誌文時大多能忠於傳主本身實際經歷過的歷史，作為傳記文絕大部分的內容。除此之外，在文末還有歐陽修對傳主的評論，都包含在「史論」與「論贊」等的論述中。而這些論述，大都是他最重視的核心思想，史家陳寅恪曾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⁵講述了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的目的，在於「貶斥勢利，尊崇氣節」，所以選取五代亂象作為題材「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逐一批判五代亂象以曉諭後人，並揭示時人正確的道德觀念，蘊含了歐陽修的政治社會責任與文化關懷。所以陳寅恪最後陳述「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說明了傳記文並非只是「空文」，而有「立言的不朽而存」⁶的重要價值。

《新五代史·義兒傳序》說：「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⁷。又《新五代史·死事傳序》中載：「自開平訖於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⁸說明當時父子之間的關係為反倫理常規，產生錯亂，骨肉間相殘，異性之人結為父子。關於儒生，把苟且偷生不離富貴當成理所當然，這些就是歐陽修所認為的五代種種亂象，所以從「論贊」歸納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褒貶的重心，在於「貶斥勢利，尊崇氣節」。在某些傳記文當中，歐陽修會透過傳主的事件來發展議論，將正確的倫理道德觀曉諭後世。後唐時的武將烏震被派令討伐張文禮。張文禮追捕烏震的母親、妻子、兒女等人來要脅烏震，烏震不理會。張文禮即割斷她們的手與鼻，當時烏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擊敗張文禮，最後升官官拜刺使。歐陽修在正史內的描述害怕讀者會將烏震的作為誤認為是「捨孝為國」、「面對敵人的殘忍，化悲憤為力量」的忠義之舉，所以歐陽修在論贊總結的部分特別講述烏震作為的失當：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眾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

⁵ 見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125。

⁶ 在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中說：「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指出聖賢能夠長存不朽的緣故，就在於他們建立德行、功業或著作。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頁131。

⁷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義兒傳序〉，頁385。

⁸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死事傳序〉，頁355。

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⁹

歐陽修認為食人俸祿者，必然有自己必須專門承擔的責任，烏震的所作所為並非其專責，又不顧自己的親人，已經算是不孝了。卻又在事成之後接受更高的利益，這是歐陽修評其「大不孝」的原因，既然不孝，就不需言其「忠」。

歐陽修的論贊大多論「忠」與「孝」，具備深刻的教化意義。除了評述傳主的一生作為與特質之外，也向讀者釐清正確的倫理觀念，也就是即便是千古之後，都不會改變的「忠孝之道」。

二、寫作動機與揀材限制人物多樣性

歐陽修寫作傳記文取材必以史事為主，從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說：「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¹⁰說明傳記文「事信言文」的重要，深知傳記文的歷史價值。但在揀材的過程中，會因為歐陽修本身的寫作動機，或資料來源短缺而導致傳記文降低整體性，變而為片面的書寫。所以即使歐陽修利用各種技巧手法突顯傳記文的真實性與文學性，避免對傳主了解的缺漏¹¹，但還是會因為種種緣故而產生片段性的作品。

歐陽修傳記文的「論贊」部分，寫作目的在「取法《春秋》」、「寓褒貶於敘事之中」，所以強調自己的倫理道德觀念，在揀材傳主生平時，會著重在傳主有關道德評價的事件中。像是〈唐臣傳·元行欽傳〉，傳中略去其他事件，歐陽修利用因果關係，描述元行欽的一生：從與唐明宗軍隊作戰「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¹²展現驍勇，先後受到唐明宗與唐莊宗的賞識。之後唐明宗反叛唐莊宗，元行欽則為莊宗殺明宗之子李從璟以免除禍患。後莊宗敗逃時，元行欽哭泣著說「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為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顯現了欲與君王共生死的決心。最後莊宗死，元行欽逃走，被明宗誅殺時大呼「先皇何負於爾！」更表現了他的忠義性格。歐陽修的寫作動機展現在元行欽逃跑的事件上，論贊說：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

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烏震〉，頁279。

¹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83。

¹¹ 《書簡》卷六嘉四年(1059)所作〈與梅聖俞〉文中載：「忽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為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己，殊不列事跡，或有記得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三去問，蓋不避一時忤忤，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達之。」梅堯臣受託請歐陽修為唐介之父唐拱作墓表(即〈右班殿直贈右羽林將軍唐君墓表〉)，歐陽修希望家屬提供的墓主事跡能具體、詳細一些，不要是空洞的評說。「再三去問」、「不避一時忤忤」，就是希望避免資料缺乏而導致謬誤。

¹²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元行欽〉，頁272。

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¹³

歐陽修寫作動機表現在強調「忠義的可貴」，是在亂世時與君王共生死的節烈。元行欽專事一主，但在莊宗死去的最後關頭，卻有逃避死亡，言行不一的作為，歐陽修認為是不能被稱作「忠義」的。略去傳主其他事蹟只著重在歐陽修義理的表達，就像姚一葦所說「凡屬藝術品或文學作品所顯示出來的人物均是片斷的，而非一個完整的人生紀錄。」¹⁴

另外，在其碑誌銘作品中，歐陽修對共同經歷「西京幕府」與「慶曆新政」時期的摯友們有著濃烈的情感，所以在這些傳主的墓誌銘裡，都會出現歐陽修對這些時光的懷念，與對傳主們懷才不遇的同情。¹⁵像是寫張谷的〈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¹⁶」；寫張汝士的〈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¹⁷；還有寫張先的〈張子野墓誌銘〉：「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¹⁸都描寫了曾經共事的時光不復在，之後強調了摯友們懷才不遇多被貶死的遭遇，表達了無限同情。這樣的寫作動機就是向後世陳述有才之人抑鬱而終的苦悶。¹⁹

由上文可知，歐陽修的寫作動機，在於強調自己本身的情感與理念，所以在揀材中有所取捨，但歐陽修還是秉持事信言文的原則，在不影響史實的基礎下，讓讀者能夠感同身受，了解傳主個性中重要的部分。

三、北宋政治運動紀實

在歐陽修的傳記文當中，有許多傳主的事蹟與北宋時期任西京留守的西崑派主將錢惟演為首的洛陽「西京幕府」，與范仲淹所推行的「慶曆新政」²⁰有關連。歐陽修在描寫傳主的這些經過時，筆法細膩傳神，且對細節有深度的刻劃。這是因為身為北宋文學家、政治家的歐陽修也曾參與過這兩項活動；並對這些過往有

¹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元行欽〉，頁 272。

¹⁴ 見姚一葦《藝術的奧秘》，臺北：開明書局，1979 年，頁 235-237。

¹⁵ 見 Denis Twitchett〈中國傳記的幾個問題〉，其認為中國私撰的傳記文會因為作者與傳主的關係而影響作者寫作的方向，影響傳記的客觀性。文章收錄於《中國歷史人物論集》。

¹⁶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 4。

¹⁷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頁 7。

¹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張子野墓誌銘〉，頁 26。

¹⁹ 美國作家 William Chamberlain 認為，作者在描寫對傳主的同情時，會使讀者在情感上產生共鳴。見丁樹南《寫作淺談》，臺北：學生書局，1974 年，頁 66。

²⁰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 年），宋朝對夏戰爭慘敗，內部動盪已是山雨欲來之勢。仁宗遂罷去宰相呂夷簡，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著濃厚的情感。而這些傳主們，也均是歐陽修在文壇上、政治上的良師益友，歐陽修對他們的描寫自然更加著力。

歐陽修初任官時，官派西京留守推官，歐陽修在錢惟演的幕府任職，結識了一批洛陽才子，形成一個文學革新的集團。其中古文家尹洙、詩人梅堯臣皆為關心政事、有志改革詩文的人。之後又結識了石延年、蘇舜欽等人，他們常在一起議論時事，研究詩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就是由梅、蘇、石、尹等開始，而由歐陽修推展成功的，歐陽修在〈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中即有描述：

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²¹

文中回憶「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表現了當時西京幕府的盛況，傳主張谷與謝絳、尹洙年輕氣盛，讓西京幕府呈現朝氣蓬勃的景象。但後來錢惟演獲罪，西京幕府衰退解散，歐陽修在〈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中描述：

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²²

文中先讚揚了錢惟演在文學上的貢獻是「多招集文士」，建立了盛極一時的西京幕府。幕府衰敗後，歐陽修的好友們都分散在各地為官，至死難以再相聚，歐陽修感慨時勢由盛而衰，好友由生而死「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在對好友的墓誌銘中將這些不捨表露無遺。另外，〈張子野墓誌銘〉也記載了對志同道合友人的思念：

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豪賢，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眾皆指為長者。……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²³

²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頁4。

²²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頁7。

²³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張子野墓誌銘〉，頁26。

由上文「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可知好友們離去又亡故，曾經最歡樂的時光永遠消失，使得歐陽修在情感上十分落寞，顯露了無限的思念之情。

另外，范仲淹在仁宗慶曆三年，推行「慶曆新政」，歐陽修表態支持，成為新政的主要人物之一。但因內容強調澄清吏治，對官吏和商人構成威脅，守舊派朝臣習於苟安，反對新政，宰相范仲淹被迫自行引退，慶曆新政最終以失敗收場，歐陽修也因此貶官外放，從〈江鄰幾墓誌銘〉中「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²⁴」可知歐陽修對因與自身利益衝突而陷害忠臣的「權倖小人」深惡痛絕。而這些被誣陷獲罪的良臣，歐陽修也在為其書寫的墓誌銘中抒發憤懣之氣，像是新政的發起人范仲淹，〈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中描述：

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²⁵

上文中「群言營營」，小人言語使得新政難以推展成功，而新政提倡者自然成為小人攻擊的目標，「惟公是傾」指范仲淹因小人誣陷而遭貶謫。還有為好友尹洙所寫的〈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廉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子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嘆息，憂悲發憤，以為生可厭而死可樂也。²⁶

文中提及小人用權使得忠良遭去，同樣是新政的成員尹洙也難逃被迫害的命運，有志難伸的情況下，哀嘆死比苟活較為快樂的情志。另外，有為蘇舜欽所寫的〈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由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眾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故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杜衍）婿也，乃以事中君。²⁷

講述有才能剛被重用的蘇舜欽，因小人而獲罪的過程。最後，還有〈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待中晏公神道碑銘〉：

²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江鄰幾墓誌銘〉，頁 70。

²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8-149。

²⁶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頁 53。

²⁷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頁 55。

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相次亦皆去，事遂已。²⁸

講述仁宗重用的包括傳主晏殊在內，還有許多一時忠良都因為小人弄權，都被羅織罪狀而遭貶謫，使得改革除弊的新政以失敗告終。由以上四位傳主的傳記文可知其共同特點，都是有才能的忠臣賢良，但都因為參與新政，而遭小人陷害的緣故而被貶謫。歐陽修也藉撰寫墓誌銘，替這些曾經共同圖求改革的有志之士，抒發不平之氣。透過傳主與傳記文的呈現，可以了解參與「西京幕府」與「慶曆新政」的經歷，對歐陽修的文學改革理念的追求與政治仕途而言占了重要的部分，也造成非常大的影響，由此可知，這兩個主題已然成為歐陽修碑誌創作的重要內容，並且歐陽修在寫作這個部分的傳記文時必定投注大量的情感，加上對事件透徹的了解，讓原本歌功頌德表現文采的墓誌，轉變成富含飽滿情感的抒情文章。另外，透過歐陽修此類傳記文，可以讓讀者了解到北宋時期政治與文學活動的重要歷程，成為研究歷史的一種依據，因此，歐陽修碑誌文又多了「紀錄史實」的功能性，更加深化了歐陽修傳記文的價值。

四、題材、文字簡練，意境加深

傳統史傳認為敘事必須「尚簡」²⁹，才能成為佳作。而歐陽修也認為傳記文要效法《春秋》，寓褒貶之意於簡煉的敘事文之中，所以說，「尚簡」並非簡短的文章字句之意，而是使用最精確的文字去詮釋最生動豐富的傳主事件，或是闡明作者的論旨。歐陽修對文句的字字斟酌，分別見於題材與文字上：

描寫北宋宰相杜衍的〈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有載：「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³⁰由此可知歐陽修講述自己作文理念是文字簡省，取材只記對傳主最重要的部分，並且只有如此才能使傳主特點彰顯於後世。另外，〈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云：「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³¹確立了唯有記載傳主的重要特點才能使傳記文流傳久遠並展示給後人學習或作為警惕。歐陽修描寫的傳主職務大多為政府官員，但每位官員的專長、貢獻、遭遇皆不同，不能鉅細靡遺地大小事全部記載，否則文章會失去主題，雜亂無章，

²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待中晏公神道碑銘〉，頁 165。

²⁹ 劉知幾《史通·敘事》：「夫國史之美，以敘事為工，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迹。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之尤美者也。」見浦起龍釋《史通通釋》，頁 168。

³⁰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101。

³¹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83。

所以歐陽修掌握每個傳主的特質加以突顯並組織成篇，而其他小事則逸去不輯。像是在〈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中歐陽修就說明撰寫杜衍的取材方式：「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³²顯示了杜衍對國家的貢獻事蹟太多，所以其他尋常之事，皆一概略去。還有像是〈徂徠石先生墓誌銘〉，篇章中絕大篇幅都在描述石介的品格高尚，不隨流俗。對〈故霸州文安縣主蘇君墓誌銘〉則是以「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³³讚嘆蘇洵文章功力的高深。

其次，文字上的簡練，金聖嘆認為不能依靠「堆砌大量的華麗詞藻」，而是應用盡量簡潔的語言，把對象的本質和特點鮮明生動地表現出來。又認為這一定的字、句，都可以超出這些字句本身的直接含義，包含更豐富、更深刻的內容，從而擴大語言的容量。皮日休《劉棗強碑》中說：「百鍛為字，千煉為句，雖不迫躅太白，亦後來之佳作業。」³⁴意即揀練字句必須字字斟酌、千錘百鍊，才能使文章「文約事豐」，這就如同歐陽修在〈論尹師魯墓志〉中，讚美尹洙撰文「文簡而意深」、「簡而有法」。像〈黃夢升墓誌銘〉³⁵就是極為生動的一篇，寫其每段時期的經歷刻劃精深卻又文字簡練，從其少時「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到初任官時「怏怏不得志，以疾去」；遇之江陵時「顏色憔悴」；遇之鄭州時「求之（文章）不肯出」，到最後「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寫黃夢升每況愈下的狀態，用字簡潔，卻能深明其旨。

就構思選材而言，每個人的身份地位、特點、命運、專才各不相同，所以所記與所略的內容自然也不一樣，而歐陽修的取材重點在於能「記大節，期於久遠」；而文字選用方面，歐陽修著重褒貶，並且用字簡練，展現「意深」、「有法」的特質。突顯主旨，刪減冗繁，傳主形象更為明確，也能使傳記流傳廣遠，真正發揮了表彰良善、警勸後世的作用。

貳、人物與敘事的文學意義

歐陽修的傳記文字，包括碑誌文與《新五代史》都是寫給當代人看的，文字的表現必須使讀者感到熟悉與可感，並且使讀者們易於了解和接受。因此它的表現形式就必須考慮到「語言」和「社會文化」的情況，此時文字表現就離不開「虛構」。黑格爾曾對此作論述：「藝術中最重要始終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因此，在表現歷史的文字上，寫作傳記文應注意當代的文化、語言。黑格爾認為「這樣破壞所謂妙肖自然的原則正是藝術所必有的反歷史主義。表現品的內在實質並沒有改變，只是已進一步發展的文化使得語言表現和形象必然受到改變」。又說「從這方面來看，我們固然應該要求大體上的正確，但是不應剝奪藝術家徘徊於虛構與真實之間的權利。」³⁶所以說，即便是歷史文

³²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101。

³³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故霸州文安縣主蘇君墓誌銘〉，頁 75。

³⁴ 見葉朗《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87年，頁 136，138。

³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 29。

³⁶ 見黑格爾《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第一卷頁 348，頁 352-353。

字，也需要文學性的文字幫襯，才能使文章為當世接受。而歐陽修寫作文章的目的，即認為傳記文有「不朽而存」、「昭示後人」的特點，所以文學性的表現是必需的。以下針對歐陽修在文字修辭、敘事結構的寫作技巧做探討，也能藉此了解歐陽修的明道之文。

一、鍛鍊字句結構篇章的寫作工夫

歐陽修曾在〈與杜訢論祁公墓志書〉中云：「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鬥速也。」³⁷清楚說明其傳寫傳記文的目的，是希望傳記文能留傳久遠，並將作者寄託在傳記文中的思想與意念傳達給後人：良善者可作為效法的目標；若有偏差的行為也可成為借鏡。所以作傳記文不僅在取材上要「據實可考」，在字句的選取上，也必須「字句斟酌」，才能達到傳記文「求真、求善、求美」的境界。

首先先探討句型結構的部分，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取材自薛居正官修的《舊五代史》，選材內容部分大多相同，但句型卻差異甚遠。《舊五代史》的句型結構大多都是四字句、六字句等偶數字句組合而成，在文體上屬於句型工整的「駢文」；歐陽修因推廣古文運動，主張「摒棄駢文，提倡散文」，所以修改《舊五代史》的偶數字句，撰寫《新五代史》時改以三字、五字與七字等奇數字句為句型安排的文字，偏向於歐陽修當時正大力提倡的「古文」。四、六字句的偶數句型句法較為工整，讀者在閱覽時可一目了然，但在誦讀時因為節奏鮮少變化，易流於呆板；反觀三、五、七字句型的文章字句，句型參差錯雜，使文章看來缺乏整齊感，但在朗誦時，可轉變型文的語氣，能將重要的字句突顯出來，顯得十分醒目。李塗在《文章精義》中說：「文字須有數行整齊處，須有數行不整齊處。」³⁸如此才能使文章富有節奏感，提升文章的生動感。

其次，在煉字方面，歐陽修十分善於運用「虛詞」。歐陽修的虛詞用字廣泛，較常見的有「焉」、「爾」、「耳」、「也」、「乎」、「歟」、「哉」、「矣」、「然」、「蓋」、「則」、「因」等十二個虛詞，大多在表現語氣的使用，通常置於一句話的結尾。雖然虛詞沒有實質的詞義，但卻能為句子突顯出語氣，加強文章的氣勢，也可使傳主了解作者在文章中的情緒反應，藉此可更深刻了解文章的情意。探討歐陽修《新五代史》中，發現在《新五代史》「論贊」中情感表達的虛詞字數量遠高於列傳部分，所以得知論贊較為主觀的部份中有強烈的情感表達。像是〈唐臣傳附論贊〉，《新五代史》、《舊五代史》的描述分別為：

傳記文名稱	《新五代史》	《舊五代史》
〈唐臣傳附論贊〉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成

³⁷ 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二》，頁 101。

³⁸ 見宋·李塗著，郭紹虞編《文章精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 70。

	<p>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于宰相矣。³⁹</p>	<p>文，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蓋為此也。⁴⁰</p>
--	---	--

以句式上來說，《舊五代史》句型整齊，採用「五、四、六、六、六、六、六、六、五、四」的句型，可見得基本上是以四字句與六字句為主要架構；另外對句多：「功不可以不圖」與「名不可以不立」、「功成而名遂」與「望重而身危」、「貝錦于是成文」與「良玉以之先折」都是對偶句式。歐陽修的書寫在此句式長短句參差，並沒有偏重在哪一種句式上，也沒有對偶句型。在虛詞的運用上，歐陽修以「嗚呼」感嘆語作為開頭，由此可知皆下來的內容必定嚴肅、令人嘆息。另外，《新五代史》中連用七個虛詞，語氣表達強烈，抑揚頓挫清晰；《舊五代史》卻僅有一個，語氣平緩，無節奏性，也無法突顯重點。

由歐陽修字句修煉可知歐陽修對文章字句安排的妥當、確切，提升文學之美。不僅如此，還表達了歐陽修的核心理念：即藉由史書的被廣泛運用性，大力倡導了古文運動；也表現歐陽修「寓褒貶於敘事之中」、「撥亂世，反之正」的《春秋》筆法。

二、靈活運用修辭技巧使文章表現生動

傳記文作者可以在基本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自己創作，通過文學性的加工，來完成一篇篇傳記文學作品。只有注重寫作技巧的運用，才能使作品富有神韻。歐陽修在「事信言文」，著重歷史性真實性的傳記文中，運用了多元的文字技巧讓文章生動活絡，像是「誇飾」、「譬喻」、「對比」、「襯托」…等文字技巧，劉知幾《史通》曾載：「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具細咸該，片一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⁴¹說明了這些文字技巧，妥善使用可精確地掌握文意，省去多餘的文字，讓文句變得精簡，也稱作是「用晦」的作文技巧。歐陽修使用「對比」的技巧是運用在時間方面：如〈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⁴²首段先從傳主張汝士的兒子在北宋嘉祐年間「改葬其先君」入題，使用追溯法回憶早年西京幕府時期，錢惟演「守河南」、「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可以了解當時歐陽修與張汝士在西京幕府時期眾人間有志一同的自適快樂。之後文意一轉，寫到二十五年之後，錢惟演早已「貶死漢南」，當時「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當時同在一堂的歡樂早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之後眾人仕途上的遭遇不盡理想，大多都不得志而終，流露出今非昔比、不堪

³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唐臣傳附論贊〉，頁 257。

⁴⁰ 見《舊五代史》〈唐臣傳·郭崇韜論贊〉，頁 772-773。

⁴¹ 見劉知幾著，蒲起龍釋《史通通釋》〈敘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173。

⁴²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頁 7。

回首的感嘆。歐陽修從文章中強調了從前與現今「聚散」、「生死」、「樂悲」、「盛衰」的對比，強化了當時西京幕府的同僚們從早期的意氣壯盛，到後來抑鬱而終的愁苦；也突顯了歐陽修對友情的不捨與懷念。林紓評論此篇時，說道：「歐文之多神韻，蓋得一『追』字訣。追者，追懷前事也。……撫今追昔，俯仰沉吟，有令人涵詠不能自己者。」⁴³可知歐陽修擅用「追憶」的手法，做懷念過去、嘆息現今的時間性對比，加強情感的表現。在「襯托」的手法上，歐陽修利用傳主與他人之間性格上的差異，來突顯作者所要表達的意念，除了讓主題更深刻外，也能增強情緒的感染力。像是〈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⁴⁴，歐陽修描寫傳主尹源與其胞弟尹洙的性格差異：「師魯〈尹洙〉好辯，果於有為。子漸〈尹源〉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說明了尹洙個性果敢，能與人辯說；而尹源個性剛直簡約，較為內斂，兩人個性呈現外放與內收的極端。接下來透過共同事件的陳述〈兩人皆考取進士、皆官至州縣、皆關心慶曆新政等國事、皆仕途不順〉，再呈現不同個性所表現的行為發展：「…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尹洙與尹源個性不同，但最後卻都因憤世嫉俗而死。尹洙個性思慮政事甚深，導致最後憂患而死；但尹源個性淡然，卻也因為當時政治的惡劣過甚，導致其亦憂慮甚深而壽命不長。歐陽修先描寫兩人個性的極端，再敘寫兩人的共同遭遇，即不見容於世且執著於國政，兩人的個性差異襯托出了當時國家政事的腐敗，連尹源都能因此抑鬱而亡。林紓評此篇時說：「吞吐不涉痕跡，是行文之神化處。」⁴⁵可見其使用襯托法精簡卻又深刻地突顯了政治對尹源的影響力。

三、以深刻透徹的論說抒發強烈情緒

抒情，是寫作的重要動人因素和基本目的。人們寫文章，不管是描繪物象，還是闡發事理，都必然滲透浸染著作者的愛憎感情。通過種種方式，將這種愛憎之情訴諸文字，就是抒發感情。⁴⁶文章如果感情濃郁，抒發暢達，就可以激發讀者的情思，引起讀者的共鳴⁴⁷，有效地增強文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清朝桐城派古文家推崇歐陽修的文章，讚其「風神絕世」。姚鼐與劉大櫟曾分別評論歐陽修散文《峴山亭記》，姚鼐說道：

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埃者，絕世之文也。⁴⁸

又劉大櫟道：

⁴³ 見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56。

⁴⁴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頁53。

⁴⁵ 見林紓《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84。

⁴⁶ 見劉勳操《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國文天地出版社，1990年，頁325。

⁴⁷ 見劉勳操《寫作方法一百例》，臺北：國文天地出版社，1990年，頁325。

⁴⁸ 見姚鼐編，王文濡評註《評註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頁1348。

歐公長於感嘆，況在古之名賢，興遙集之思，宜其文之風流絕世也。

49

都認為歐陽修的寫作手法獨特不落俗套，擅用感嘆法來緬懷古代先賢，文章富有情緒感染力。劉大櫚在評歐陽修的記敘文《真州東園記》說：

柳州記山水從實處寫景，歐公記園亭從虛處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勝，歐公園亭以敷娛都雅勝。此篇鋪敘今日為園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蕪，更有情韻意態。⁵⁰

綜合上文可知，桐城派古文家所指歐陽修寫作的「風神」，即為在行文時表現豐富的情感，而這樣的情感表達方式，就是歐陽修長於感嘆的寫作技巧。

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序》⁵¹主要在講述後唐莊宗一生由盛而衰的經過，事件從其父李克用臨終遺恨推演到其報仇成功的得意，再繼續推展到其失敗時的悲慘境遇。歐陽修在這篇文章中表達了強烈的情緒，可從使用感嘆用法來做說明。文章一開頭即說明主題：「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說明了國家興亡的原因，大都因為人事的問題。句首即用感嘆開頭，對後唐莊宗復仇成功後不能妥善地治理國家而導致國家滅亡，表達了哀嘆，也有勸誡後人的意味。接下來講述了莊宗的失敗，總結「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說明了人的本身就是成敗的主要原因，再一次嘆息莊宗原本意氣之強盛就因為人事不修而衰敗，也與文章開頭的感嘆做了連結。最後總結文意，說明「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哀嘆莊宗不僅對治理國家無所作為外，還寵幸伶人，招致敗亡。歐陽修在文章中不僅說明了事件經過，也論說了「盛衰的關鍵在人事」的道理，用來警醒後世為政者。在論述中歐陽修也常用感嘆語氣抒發自己的情感，加上嚴正的說理語氣，使得情感的抒發更為強烈。

感嘆的寫法在情感上表達較為含蓄，使文章留有餘韻，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絃外之音，像先秦時荀子所說的「一唱（倡）三嘆」⁵²、劉勰的「文外曲致」⁵³、「情在詞外曰隱」⁵⁴、梅堯臣所言「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⁵⁵都是要讀者去體

⁴⁹ 見劉大櫚《劉大櫚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02。

⁵⁰ 見劉大櫚《劉大櫚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6。

⁵¹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新五代史·伶官傳序》，頁397-399。

⁵² 荀況《荀子·禮論》：「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用來指文章字句婉轉而含義深刻。見熊公哲注釋《荀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427。

⁵³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指文章明述的意旨外還有細微的意旨，並不是言詞所能表達的，留給讀者自行體會。見陳拱《文心雕龍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644。

⁵⁴ 劉勰《文心雕龍·隱秀》：「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這是說隱的意思，就是「義生文外」、「情在詞外」，意旨不顯現於篇章之中的意思。見陳拱《文心雕龍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985。

會作者沒有明白表達出來的情意，也有打動人心的效果。

四、敘事模式呈現委婉曲折文風

歐陽修撰寫傳記文，均是以傳主為中心，傳主的性格為生平事件發展的重要導向；也就是說，人物的性格可以決定其一生的發展走向。而歐陽修在組織篇章結構上，也會因為傳主的性格來選擇篇章結構模式。

在歐陽修的文章敘事結構模式裡，分為「並列式結構」、「平提側注式結構」，以及「因果式結構」。「並列式結構」是由人物的各種同樣性質的事蹟來突顯傳主的性格；「平提側注式結構」與「並列式結構」相似，但兼有書寫不同性質的事蹟，傳主性格較為多元不呆板；「因果式結構」因為是記述傳主性格變動的因果歷程，事件轉折較為繁複，所以在這個結構中，歐陽修對傳主的事蹟與了解必須是較為熟悉、較能掌握的，也因為有充足的了解，所以在文章內容上也會多有著墨。

像是〈新五代史·宦者傳序〉⁵⁶先指出宦官「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講述宦官職務太親近皇帝，但他們專橫又殘忍，懂得用小恩惠來攏絡人心，讓皇帝相信他們。到取得國君的信賴後，文章轉折，寫宦者「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後來君王反被宦者以福禍言論挾持，文意又轉折寫道「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皇帝認為朝廷的忠臣和博學之士距自己很疏遠。忠良之臣被疏遠之後，「人主之勢日益孤」皇帝的勢力就日益孤立，而勢孤之後，又轉到「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闈闈」。宦官挾持君王權利日益穩固，國家的安危出自於他們的喜怒，而成為嚴重災禍，此時君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想聯合臣子算計宦官，時機的快慢都不可行了，最後到「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謀劃消滅宦官的計策不能成行，也不會成功的地步，君王與宦者兩敗俱傷，人亡國滅。歐陽修的這篇傳記在說明五代時期宦者造成的災禍，先由宦者在君王身旁朝夕陪伴，表現出的小善小信逐漸讓君王倚賴，一直到君王殺身亡國。整篇文章的描寫表現了曲折層疊的過程，文章一層層深入地推演，將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透過由因及果的方式寫出，將因果關係清楚地釐清。由此可看出歐陽修對五代時期宦官干政的狀況有清楚的了解，才能使因果脈絡清晰呈現。在情感表達上，這種由因及果、層疊的書寫方式可使情感立體化，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道：「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舒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⁵⁷」文中「紆餘委備」代表了文章含蓄委婉的特色，而「往復百折」是表

⁵⁵ 梅堯臣描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意思是能把難以描寫的東西刻畫得如同在眼前一般，而詩文的意境深刻卻又沒有直接表達在詩文之中。見《宛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640。

⁵⁶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宦者傳序〉，頁406-407。

⁵⁷ 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28。

現文章跌宕抑揚的寫作方式，兩者都說明了歐陽修文章不單刀直入陳述重點，而是委婉曲折的風格。清人魏禧云：「歐陽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⁵⁸」文中「說而不說」讓文章呈現「吞吐掩抑」的效果，即為「抑揚」、「跌宕」；又「說而又說」講述的是歐陽修描述事件採回環反覆的手法，含蓄又委婉，即為「迂迴」、「紆餘」的手法。如此因果往復，步步前進，文章轉折之後，確立論點，即為歐陽修寫作傳記文時「紆餘委備、抑揚頓挫」的結構特色。

第二節、歐陽修傳記文的價值

壹、歐陽修傳記文的成就

歐陽修傳記文的成就共有三點：第一點是「寫作技巧多元化，介於史傳與小說之間」。藉由對人物內外部刻畫的技巧，以及作文的章法字句結構，討論歐陽修傳記文的特點；第二點是「寫作手法承襲《史記》，寫作目的承襲《春秋》」。將歐陽修傳記文和《史記》、《春秋》相對比，就其間的關係探討歐陽修寫作的目的與技巧；第三點是「繼承前人寫作風格，又能超越前人獨創新局」。探討歐陽修傳記文如何承繼前人優點，又能開創新局，讓後世作家效法。

一、寫作技巧多元化，介於史傳與小說之間

歐陽修的傳記文無論是《新五代史》或是碑誌文都取材於歷史題材，而歐陽修寫作傳記文的目的，是承襲《春秋》筆法「事信言文」，將五代的亂象詳細寫出，並秉持「不朽而存」的理念來揭示當世之人。歐陽修運用文采，刻劃人物、組織文章架構，用以打動人心，活絡的人物形象與高度的文學性，使得歐陽修傳記文跳脫史傳束縛，趨近於小說。關於史傳與小說之間的區別，金聖嘆認為歷史敘事為「以文運事」，而小說敘事則稱為「因文生事」。也就是說歷史只是一種敘事話語，是與外部世界構成「毗鄰性」關係的「轉喻」世界；小說實際上是借助寫作法則建構而成，是與外部世界構成「相似性」關係的「隱喻」世界。⁵⁹佛斯特也指出：「歷史家也像小說家一樣關注性格，但是他只能就人物外在表現而定其存無（某種性格特質的有無）……小說家的功能就在表現內心深處的內在生活。」⁶⁰另外，魏飴在《小說鑑賞入門》中說：「…直接概述（史傳），是指作者直接揭示人物的身世、經歷、性格、心裡跟神貌的一種表現方式……然而，小說寫人更多的是運用間接表現的方式，這一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對人物的內外狀貌作具體形象的刻畫，其人物的思想內涵、個性特點就好比是戲劇一樣是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來具體展示的。」⁶¹由佛斯特與魏

⁵⁸ 見清·魏禧《魏叔子集·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

⁵⁹ 見葉朗《中國小說美學》。臺北：里仁出版社，1987年，頁74。

⁶⁰ 見佛斯特《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年，頁38。

⁶¹ 見魏飴《小說鑑賞入門》。臺北：萬卷樓出版社，1999年，頁31。

飴對史傳與小說的區分，我們可知小說比起史傳來說，必須將「人」的內外部描繪加入更多的文學性，也就是「敘事性」、「虛構性」、「散文性」、「文字語言的自足性」等特色。⁶²

在情節的架構方面，描寫〈敬新磨〉傳，第一，有明確的主題：以「善言詞」來貫穿全篇文意；第二，有確切的題材：陳述三件以言詞化解緊張的局面；第三，人物事件明確：在「伴君如伴虎」的壓力下，傳主巧妙的言詞為其保命；文章布局有條理，從事件開端、過渡、高潮，到忠義之人有善終的結尾，精采活絡的程度近似小說。在虛構的部分，歐陽修本不信佛道之說，但在傳記文中加入許多虛幻的場景來表現傳主不彰顯於外的內心想法，像是寫後唐王仁裕「好學」，藉由其夢境「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⁶³還有以異象突顯袁正辭「斂財」形象：「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⁶⁴，描寫其貪財而無法辨別是非。最後，歐陽修善於利用誇飾、譬喻、對比、襯托等修辭技巧來加強傳主的形象性以及對事件的區別性，引導讀者對於不同傳主都能明瞭其個性的差異性。

這些特質使得歐陽修的傳記文能不同於一般只追求敘述文字之「真」，而無感動人心的文字之「美」的史書，增加了小說中描寫人物的豐沛情感與文字力度。而歐陽修傳記文不能稱之為小說的原因，也是因為描述主體不脫離傳主一生發展的真實性，沒有過多的想像虛構的參雜，所以說寫作技巧的界定是介於史傳與小說之間。

二、文學思想淵源於《史記》與《春秋》

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對歐陽修《新五代史》的評價：

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筆法，寓褒貶于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⁶⁵

這番評論講述了歐陽修《新五代史》文筆潔淨老練的手法，與司馬遷《史記》相似；而其寫作目的似《春秋》「寓褒貶於紀傳之中」，由此可知歐陽修寫作傳記文在文筆與目的上，各承襲了史書上的經典《史記》與《春秋》。又方苞在《古文約選序例》中說：「敘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⁶⁶在此指出歐陽修的敘事文與《史記》寫法相類似，

⁶² 「敘事性」即為「情節」，作者將人物在環境中的各種行為想法組織起來，形成作品；「虛構性」是指描述一些傳主並未經歷過的現實或奇幻景象；「散文性」指用平易近人、自然的文字來組織成文章；「文字語言的自足性」是指利用文字書寫即能成就人物的形象刻劃。見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8-11。

⁶³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四十五）·王仁裕〉，頁662。

⁶⁴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雜傳（三十三）·袁正辭〉，頁495。

⁶⁵ 見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世界出版社，1980年，頁285。

⁶⁶ 見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頁166。

是因為他揣摩了《史記》的格調。而關於《史記》的「格調」，茅坤曾在《唐宋八大家文鈔》中做說明，即：「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捐次，獨得妙解，譬之覽先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世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為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⁶⁷由茅坤的說明，可知「義法」的定義有二：在「法」的方面「馳驟跌宕」，指的是其筆法婉曲，跌宕抑揚；另外，「點綴捐次，獨得妙解，譬之覽先姬於瀟湘、洞庭之上」指的是描述人物形象細膩深刻且生動。這兩點與歐陽修作文寫作手法的特點相同，所以茅坤之後也提出了讚揚歐陽修傳記文與司馬遷不相上下，且在歐陽修的時代裡，其為唯一能領略司馬遷寫作精髓的作家。像是寫黃夢升，不直接寫他懷才不遇的人生，而是以時間的遞進作因果式的書寫，以呈現反差。從歐陽修初遇黃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清秀，善飲酒談笑」⁶⁸意氣風發的神情姿態，沒想到後來再相遇時轉為「顏色憔悴」，之後再在鄭州相遇，求其文，但其「不肯出」。歐陽修用簡練的文字將黃夢升各時期的狀貌與姿態刻劃的細緻活絡，而且以時間今昔作對比，間接敘述黃夢升的遭遇，層層遞進，有跌宕婉曲的效果。在「義」的方面，東漢·班固所撰《漢書·司馬遷傳》中，寫到《春秋》的性質是「以道義」，揭示了《春秋》的義理批判性質；又提到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存亡國，繼絕世」、「撥亂世，反之正」、「長於治人」⁶⁹。表示在記述歷史時，暗含褒貶的「微言大義」。歐陽修承襲「春秋筆法」，所以在寫〈一行傳序〉時提到：「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⁷⁰作史的目的，正是為了抨擊這些他認為沒有「廉恥」的五代亂象，也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⁷¹的目的。所以可以說，歐陽修在撰寫這些實用性高、可留傳於後世的傳記文時，往往會蘊含自己的主觀情緒與作文理念在其中，以向時人或後人表達自己寫作時「文以載道」的態度，與作史書時「屬辭比事」的寫作風格。

三、改善前人缺漏，風格獨創

歐陽修的寫作風格在思想上與行動上都承襲韓愈的文學理想而來，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一文中講述其推廣韓愈文不遺餘力的情況，並自命為韓愈的繼承人，從蘇軾曾評其：「歐陽子，今之韓愈也。」⁷²說明時人也贊同歐陽修承襲韓愈的合理性。

⁶⁷ 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廬陵文鈔》卷二十九。臺北：藝文出版社，1966年，頁1497。

⁶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黃夢升墓誌銘〉，頁29。

⁶⁹ 見東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北宋景祐刊本，唐·顏師古注，王雲五編，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10年，頁776。

⁷⁰ 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五代史》〈一行傳序〉，頁369。

⁷¹ 見史次耘註譯《孟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9年，頁175。

⁷² 見滕志賢注譯《新譯蘇軾文選·六一居士集敘》，臺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331。

在傳記文的篇章數量上，韓愈傳記文共 101 篇，柳宗元則有 96 篇，均不及歐陽修傳記文。略去《新五代史》而專論墓誌銘，歐陽修有傳記文共 154 篇。在寫作對象上，歐陽修傳記文對象包括了當朝文武官吏、女性傳記、以及至親朋友等類型；韓愈墓誌銘大多記載在朝官員，僅有〈圻者王承福〉為平民傳記；柳宗元長期貶官在地方上為官，所以傳記文中有較多的平民傳記，像是〈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宋清傳〉、〈童區寄傳〉…等。墓誌銘刻於墓碑上，用以記錄傳主事蹟以揭示後人，「諛墓」之作難以避免，韓愈、歐陽修的墓誌銘皆有虛美的內容出現，但歐陽修在「孝愛親友類的」作品裡，為親朋好友展現強烈的情感與寫作的熱忱，描寫與傳主們生平交遊點滴以及為其抒發不平之氣，創造「情文並茂」的風格，也提高了文學價值，像是〈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梅聖俞墓誌銘〉、〈張子野墓誌銘〉、〈黃夢升墓誌銘〉…等，都屬此類作品。

韓愈領導唐代古文運動，提倡寫作要「文從字順」、「文以載道」，將墓誌的地位從應用文體到文學散文的創革。韓愈在結構（墓誌當作列傳寫）、手法（典型事件與細節描寫）、句式與押韻（之前多遵循四言韻文的格式，其每篇格式不同）、內容（不歌功頌德）上都有不同於以往的創體之姿，主要在於教化的作用。歐陽修即承襲韓愈的寫作手法，刻劃生動的人物形象，利用修辭等文字技巧提升文章文學性，利用篇章結構、修煉字句架構文章，脫離了平沓重典的傳統碑誌文字。

但韓愈墓誌銘中，有部分作品摹擬《尚書》等古代經典著作，像是〈曹成王碑〉、〈平淮西碑〉，文章用奇重字，讀起來詰屈聱牙，尚未脫離當時濃厚的六朝駢儷氣息。歐陽修的作品，將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統一起來，強調作品必須有作者個人的特色，藝術風格必須有獨創性，反對因襲模仿。另外，碑誌追求「奇」，兼指氣、神、文字之奇，使得韓愈碑誌有傳奇性，碑誌中夾雜了詩筆與議論，結尾的銘大多是四言詩歌、有些則為楚辭體。追求怪奇，使得韓愈碑誌有誌怪的特徵，像是〈柳州羅池廟碑〉即為此例。但歐陽修文字較為婉曲平實，力求自然，像是〈黃夢升墓誌銘〉以平實自然的文字來描寫與傳主黃注每一次相遇的情景，將黃注每況愈下的情緒反應如實寫出，文字平實無任何矯飾，也因為如此，歐陽修的文章風格更通俗、更符合實用。蘇洵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道：「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舒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⁷³」總的說來，韓文以氣勢雄健見長，歐文則以風格婉轉見長，兩者的散文風格迥然不同。

由此可知在散文的創作方面，雖然標榜學習韓愈，但能適時改善韓愈的不足，自成一派，創造出一種與韓愈不同的散文風格。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有這樣一段話：「歐公文學韓而頗不似韓，此公文之所以能於八家中自樹一

⁷³ 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28。

幟也。」⁷⁴可以了解歐陽修學習、繼承韓愈的創作理念，但又能獨樹一格，創造新局的格調。

貳、歐陽修傳記文的影響

一、「據實直書」的精神為當世史學家所取材與效法

歐陽修撰寫傳記文秉持謹慎莊重的態度，原因在其〈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中描述：「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⁷⁵認為傳記文有流傳久遠的特性，所以應該要「據實直書」，強調取材的客觀真實性；另外還要「宣揚正確的價值觀」讓後世之人效法，以達到「不朽而存」的文學價值。因為如此，當代的史書大都以歐陽修的傳記文內容為取材的對象，像是李燾所著的編年體北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元丞相脫脫等人所編修的《宋史》，都採用了許多歐陽修傳記文的人物與事蹟來作為正史內容。

《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講述官員蔡襄的生平事蹟：

襄世閩人，知其風俗。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襄得(周)希孟，專用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至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訓教之。及襄去，閩人為立德政碑。⁷⁶

再以歐陽修作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兩相比較：

公為政精明，而世閩人，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奸民、遊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

⁷⁴ 見袁枚著，楊家駱主編《箋注隨園詩話》。臺北：鼎文出版社，1974年，頁144-145。

⁷⁵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頁79。

⁷⁶ 見李燾編著，徐光烈譯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7。臺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463。

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⁷⁷

兩篇文章除了對傳主的稱呼有所不同外（《長編》稱蔡襄「襄」，《墓誌銘》稱其「公」），事件上的安排、行文的方式，甚至選用的文字，除了「公為政精明」、「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奸民、遊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公曰：『弊有大於此邪！』」、「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等文字是《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所沒有的，其他文字完全相同。而就這些簡省的文字來看，都是蔡襄所推行的政策後補充性的文字，略去不太影響文章的意義，但增加這些添加情感的文字「精明、甚害、愧恨、無限極」或是傳主的話語「『弊有大於此邪！』」，都能使蔡襄的形象更為生動，由此可知，在記史的態度上，歐陽修不僅要記述傳主的事蹟，還要豐富傳主的形象，達到傳記文對「美」的要求。《宋史》中許多傳主也多採用歐陽修傳記文的內容，也是取歐陽修傳記文人物的重點撰寫成篇，像是歐陽修傳記文〈江鄰幾墓誌銘〉與〈宋史·江休復傳〉即為此例。〈宋史·江休復傳〉在事件表達上與〈江鄰幾墓誌銘〉完全相同，只在字句上作部份增刪。

另外，宋人筆記承襲歐陽修傳記文的「實錄原則」，對事件具體陳述，所以當時政治上較為隱諱的事件，藉由宋人筆記與歐陽修傳記文可相互驗證。〈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中描述宰相呂夷簡與范仲淹交好的一段文字：「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⁷⁸因呂夷簡任宰相時，排斥慶曆新政，許多賢能之人都被罷去，其與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成為政敵。所以這段文字被范仲淹的後人在刻碑時刪去不用，引起爭議。關於這點，司馬光的《涑水紀聞》中就有記述：「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掖！』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邪！』」⁷⁹蘇轍的《龍川別志》也有記載：「自越州還朝，出鎮西事，恐許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⁸⁰這些宋人筆記書寫的

⁷⁷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二》〈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頁 81。

⁷⁸ 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一》〈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頁 149。

⁷⁹ 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八。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 388。

⁸⁰ 見蘇轍《龍川別志》。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86年，頁 20。

文字均能與歐陽修的傳記文互相參照，即能肯定歐陽修所描述的「歡然相約戮力平賊」的言詞，也了解當時政治上最爲真實的一面。

由上文可知歐陽修傳記文的史學價值是非常高的，因爲秉持「據實直書」的寫作態度，其墓誌銘讓許多北宋的人物事蹟與重要史料因爲如此被完善保存，使得當代史家得以方便取材。還有當代文人所作的筆記，像是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蘇轍的《龍川別志》…等，都能與歐陽修的墓誌銘相互參照，對應當時最客觀真實的史事。另外，歐陽修獨撰的《新五代史》爲了添加文學性，雖然改變《舊五代史》的行文方式與書寫技巧，但傳主的生平事蹟歐陽修還是據實採用，貫徹其對傳記文「據實直書」的精神，更提高了本身的史學地位與價值。

二、其寫作風格為明清散文家所承襲

薛錫振認爲，傳記文源起於史傳，⁸¹所以說，能表現傳記文特徵的古代散文，以及描述事件性質較爲顯著的文章，大多都是從史書的列傳中發展而來。韓愈領導唐代古文運動，提倡寫作要「文以載道」，將墓誌的地位從應用文體轉變而成爲文學散文，成爲傳記文學史上的創革。韓愈在結構、手法、句式與押韻，以及內容上都有不同於以往的創體之姿，主要在於「教化」的作用。像是其〈圻者王承福〉爲平民傳記，雖然寫作篇章數量稀少，但已脫離一般墓誌銘應用文體的型態；繼承其寫作精神的柳宗元則有較多的平民傳記，像是〈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宋清傳〉、〈童區寄傳〉…等。到了北宋時期的歐陽修，更是承襲前人的寫作方式與目的：在題材的選取上，其傳記文《新五代史》與墓誌銘都屬於歷史的部份，所以文章寫成爲「史傳」類型。又因歐陽修承襲「春秋筆法」，以「教忠教孝」爲其寫作目的，所以會將傳主的日常生活瑣事略去不寫，著力於其核心主題；另外，其藝術的表現上，歐陽修行文自然簡潔不矯造，利用修辭技巧來突顯傳主的人物性格，使用靈活變化的篇章結構來提高文章的生動程度。「題材」與「藝術表現」的改變將傳記文的藝術技巧與作文意義的境界更加提升，這樣的寫作方式即成爲明清時期「古文傳奇化」⁸²的先驅。

明代初期散文風格以「擬古」爲主，詩文風格爲「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因模擬古人的方向爲內容的技巧與文章架構，而非寫作文章的教化意義，以致流於空泛，降低了文學的價值。到明代中葉之後，古文家茅坤與歸有光提倡學習「唐代與宋代的詩文」，提倡「文從字順」，顯現了追隨韓愈與歐陽修的寫作精神「文以載道」，開始強調文章內涵的意義與精神。明代歸有光的散文源出於《史記》，取法於歐陽修，在風格上樸實自然，在感情上強烈真摯。其擅長的文體爲抒情類的短篇故事，像是〈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用白描法寫作，文章內容描述其經驗事物，像是與至親的相處時光、對物的強烈情感、對其志向的堅定傾訴。文章技法毫不矯飾，文字平易流暢，能使讀者深刻感受作者情

⁸¹ 見薛錫振〈我國古代傳記文學發展軌跡鳥瞰〉，《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3期，頁100—104。

⁸² 見陳文新《文言小說審美發展史》，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

緒，被譽為「明文第一」⁸³，時人稱他為「今之歐陽修」。歸有光在明代可以說是歐陽修以後最能得其神似的古文家，但篇章數量還是不多，影響當代文學風格有限。

清代的傳記文發展，以桐城派古文為主。其「桐城三祖」方苞、姚鼐、劉大櫟等文章風格，都以雅致潔淨為寫作原則，更以文學的意義與價值為著力的方向，由此可知，明代的歸有光與北宋的歐陽修就是他們學習的前代作家。桐城派推崇的寫作風格，由姚鼐歸納前人傳記文為「陽剛」與「陰柔」兩大風格說起。「陽剛」屬性的傳記文，氣勢雄偉壯闊，像是韓愈的文章風格。而「陰柔」的文章，情韻幽雅婉轉不直陳濃郁的情緒，這一類的文章風格代表人物即為歐陽修。桐城派的風格，偏向歐陽修的「陰柔」風格。當時名著像是戴名世〈畫網巾先生傳〉對人物的刻畫利用近於小說的手法寫成，人物形象更為活絡。方苞〈朱竹君先生傳〉的寫作題材承繼了方苞所謂的「常事不書」原則，也是「古文傳奇化」的特徵，指在寫作人物時只取傳主的重要事蹟來做為題旨。另外其文章與歐陽修〈黃夢升墓誌銘〉相似，描寫傳主形象委婉含蓄：「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復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為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為學先識字，語意諄勤」⁸⁴用簡潔的敘事方式，就可描繪出傳主生平事件與性格特質，顯現人物「神韻」之姿。時人稱讚「惜抱先生文以神韻為宗」⁸⁵。姚鼐受歐陽修的影響很深，林紓曾評姚鼐說：「惜抱（姚鼐）慕韓而近歐。」⁸⁶總的說來，桐城派的散文風格偏重於「陰柔」，因此必然以歐陽修為主要的學習對象。

本論文以「人物論」的方法論來探討歐陽修傳記文的成就，將其所撰的《新五代史》與墓誌銘利用傳記文的文學性角度，對比僅用史學角度做詮釋的歐陽修傳記文。經過以上篇章的探討及分析後，可以了解歐陽修傳記文中使用文學技巧產生濃厚的文學之美，脫離傳統史傳的風格轉而展現小說的生動性；將豐富的情感娓娓道來，呈現在文章之中，表現強烈的情緒感染力。後世作家推崇與承襲歐陽修傳記文風格，歐陽修傳記文學影響後世傳記文甚深，也奠定了歐陽修在傳記文學上的重要地位。

⁸³ 見黃宗羲著，平慧善，盧敦基譯注《黃宗羲詩文·明文綜序》，臺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68。

⁸⁴ 見姚鼐編，王文濡評註《評註古文辭類纂》。臺北：華正書局，1987年，頁175。

⁸⁵ 見方宗誠《論文雜記·桐城文錄序》。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48。

⁸⁶ 見姚鼐編，林紓選《古文辭類纂選本》卷八。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178。